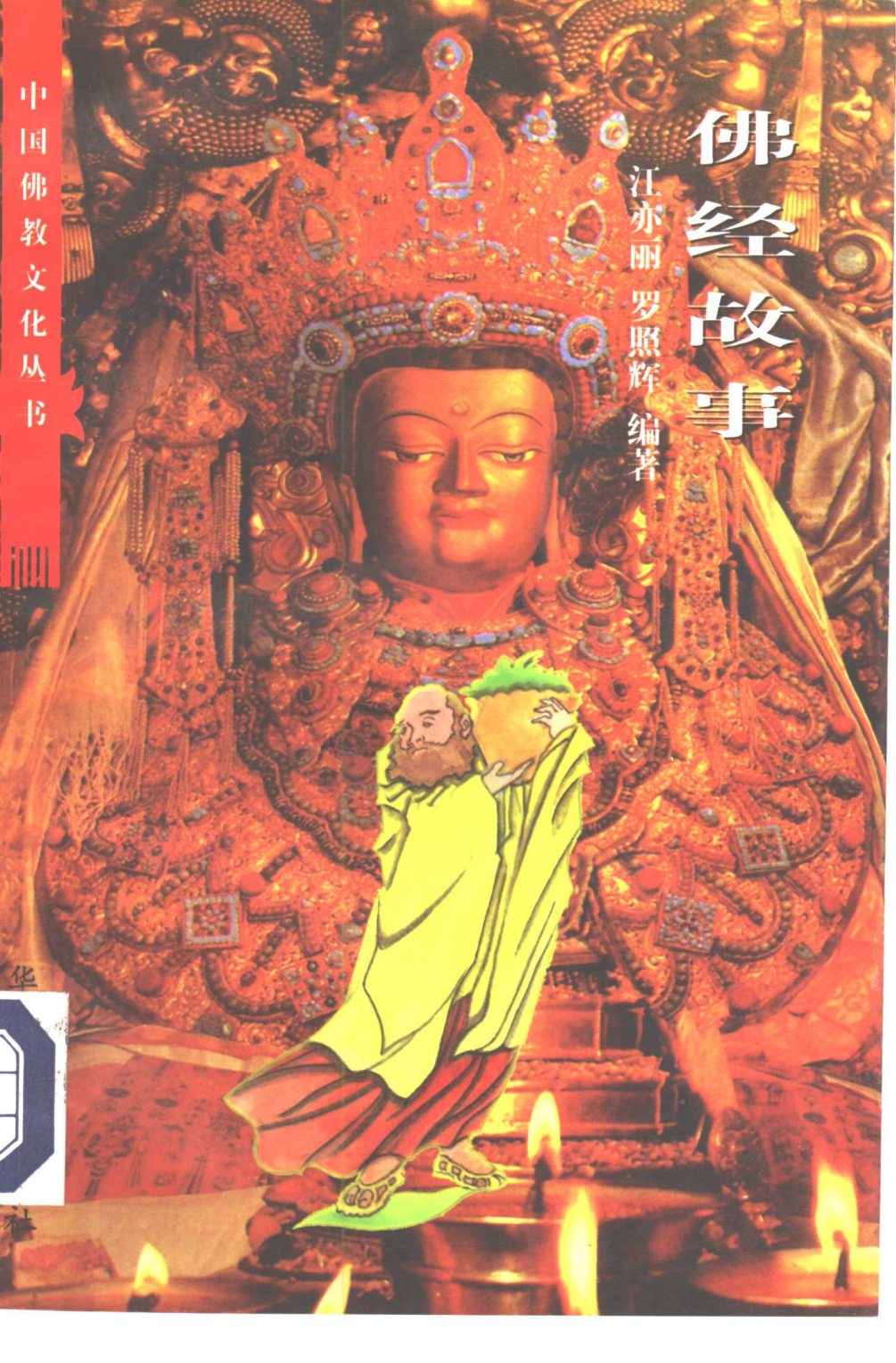


佛经故事

江亦丽 罗照辉 编著

中国佛教文化丛书



华

社

中国佛教文化丛书

佛经故事

江亦丽、罗照辉 编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经故事/江亦丽, 罗照辉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7. 1

(中国佛教文化丛书)

ISBN 7-5075-0582-0

I. 佛… II. ①江… ②罗… III. 佛经—故事 IV. B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9528 号

佛经故事

编 著 者: 江亦丽 罗照辉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圣云

封面设计: 王铁麟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7990 63099271

邮 编: 100800

印 刷: 密云胶印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582-0/B. 15

定 价: 16.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前 言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6 世纪至公元前 5 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期印度已进入奴隶社会，社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手工业亦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航海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奴隶制国家建立，形成列国交战、诸侯争雄的局面。奴隶制的发展，使阶级矛盾趋于激化。当时印度已存在种姓制度，共分四个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以

祭祀为生，掌管宗教及文化大权，居于最高位；刹帝利是王侯、武士阶层，居第二位；农工商等庶民居第三位，名为吠舍；沦为奴隶的土著居民居第四位，名首陀罗。当时的《摩奴法典》严格规定了这四个种姓的权利、义务和差别。

婆罗门飞扬跋扈，目空一切，激起了其它种姓、尤其是刹帝利的不满。刹帝利是新兴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在列国争雄中他们的作用增加、地位上升，要求无限制地扩大本阶级的权利。但传统种姓制度，使他们难以如愿，因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与婆罗门存在较深的矛盾。吠舍种姓已开始分化，一部分成为工商业奴隶主，另一部分沦为奴隶。首陀罗是受压迫的种姓，被剥夺一切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权利。奴隶们奋起反抗，与奴隶主展开斗争。

总之，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社会动荡的变革时期。这些斗争和变化也反映在思想领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反婆罗门的沙门思潮不断涌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六师外道”。这些哲学派别理论虽各不相同，但均反对婆罗门教的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六派沙门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婆罗门信仰的动摇，反映了社会各阶级矛盾变化，同时也为佛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释迦牟尼

尼作为新兴统治者刹帝利阶级的代表，正是在这种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创立了佛教。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具有鲜明的反婆罗门教色彩。它以缘起论反对婆罗门教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制度，以无我论反对婆罗门教的“梵我如一”论。因此，佛教吸引了广大下层群众，同时也得到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一时间声势浩大，流传广泛。

佛教在印度大致经过四个时期，即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和密教时期。原始佛教时期大约从佛陀创立佛教至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此期为佛教的初传阶段。

部派佛教时期是佛教派别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约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叶。佛陀仙逝百年后，佛教僧团因对教理和戒律的理解不同而发生分裂，先后形成了许多部派。最初分裂为大众部和上座部，以后又从这两部中分裂为18部或20部。这些部派形成了自己不同的思想体系。

大乘佛教时期约从公元1世纪中叶至公元7世纪，主要派别有以龙树为代表的中观派（空宗）和以无著、世亲为代表的瑜伽行派（有宗）。大乘佛教的教理与原始佛教已有很大差别。

密教时期大约从 7 世纪至 13 世纪。密教是佛教与印度教结合的产物，它以繁琐神秘的咒术、仪式为特征。原始佛教是反婆罗门教的，对于婆罗门教的多神信仰、吠陀经典中的真言、密语及宗教仪规一律加以反对。到大乘佛教兴起后，却逐渐引进了婆罗门教的禳灾、祈福和多神信仰观念，使那些密咒真言合理化、佛教化，最后形成独立的密教体系。

13 世纪初期以后，由于阿拉伯人入侵印度，佛教在印度消亡。直至 19 世纪又从斯里兰卡重新传回印度。

印度佛教虽然在 13 世纪就消亡了，然而佛教在其它国家却流传广泛。它早在公元前 3 世纪即向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以后向北则传入我国，又通过我国传播至朝鲜、日本。

二

两汉之际，佛教随着我国与中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而传入。关于佛教传入汉地的最初年代，尚无定论。一般认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浮屠经》，是佛教传入的开始。亦有“明帝求法说”。据传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夜晚梦见金人在殿庭前飞行，翌

日，明帝把夜间之梦告诉了大臣们，并问他们昨夜梦中飞行的是什么神。太史傅毅答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轻举能飞，陛下所梦的大概是他。明帝遂派蔡愔等人去西域寻求佛法。蔡愔一行长途跋涉，于永平 10 年（公元 64 年）在大月氏国遇见了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并邀请他们去汉地传播佛教。迦叶摩腾与竺法兰接受了邀请，用白马驮着经卷，随蔡愔一行来到洛阳。明帝大喜，给予两位沙门很高的礼遇，并特意为他们建立了精舍，命名为“白马寺”。这是中国的第一所佛寺。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与中国的文化碰撞、融合，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开花，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呈现出纵横两条主线。从纵向看，它经历了近二千年的漫长岁月和兴盛衰落的变迁过程；从横向看，它的传播范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遍及整个中国大地。

确切地说，纵线即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它可分为依附、融合、繁荣、衰落四个时期。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开始只在统治阶级上层流传，后来逐渐发展，与社会上的宗教迷信相结合，成为一种神仙方术。它利用符咒、占星、治病、禳灾、祈福等方术来吸引群众。所以此时期佛教是依

附于神仙方术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发展，译经日增，宗派初立。此时的佛教，与魏晋玄学关系密切，是佛玄融合时期。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顶峰。寺院林立，僧徒遍地，宗派繁多，一派“繁荣”景象。隋唐佛教，与儒、道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此时，是佛教最繁荣的时期。

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思想意识也随之变化。佛教从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走向宋明以后的三教会同，形成了以儒教为主，佛、道为辅的局面。佛教已走下坡路了。然而，实际上佛、道二教已渗透到儒教之中。

清末民初，中国封建社会解体，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意识形态也相应变化。这一时期的佛教在社会上仍有影响，但由于西方现代思潮已传入中国，佛教日趋衰落。

以上是中国佛教的纵线。从横的方面看，中国佛教又可分为西域佛教、汉地佛教、云南小乘佛教和西藏佛教。

三

佛教在印度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印度的文化宝藏。可惜这些文献大部分在十二世纪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入侵印度而毁于战火，只在巴利语和汉译佛经中得到保存。佛经故事即是保存下来的佛经的一部分。

佛经故事是佛陀为宣传佛教的教理而采用的一种形式。佛陀成道后，首先在鹿野苑为五个弟子宣讲佛法。佛陀反对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因而吸引了大批来自低级种姓阶层的信徒。如何将自己的思想表述得浅显而清晰、简明而准确，使这些满怀希望的文盲听众更加笃信不移，佛陀不得不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过去深居宫庭时所熟悉的语言显然不适用于乡野百姓，佛陀决定尽量以信徒的语言、以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来解说自己深奥的理论。好在他有较深的文学功底，受过专门的教育，出家以来又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对民间流传的各种知识、文化耳濡目染，融会贯通。当时民间流传着无数美丽动人的传说和寓意深刻的故事，短小精悍，喻事明理，是人们爱与憎、祈求与理想的反映，存在着普遍的群众基础。这些故事往往是口传心授，代代都

有发挥。而且印度史诗文学发达，《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流传于庙堂江湖，其中的无数个小故事启人智慧。于是，佛陀在传经布道时，对这些民间故事、史诗文学加以附会，亦运用自己广博的知识自编一些故事，用浅显的俗语、生动的譬喻解说自己的教理，深入佛法的精髓。这就是佛教文学故事的由来。本来是一些平凡的故事，经佛陀随意取舍，随时讲说，成了宗教宣传的工具，蕴含了丰富的佛理。以后又有无数位高僧大德加以承继，加以发挥，枯燥的理论变得越来越完善易解，故事的文学性也越来越强。尤其是在佛陀涅槃后，信徒编纂了大量有关他的生平传记，包括蒙上神秘外衣的本生故事。这些佛传、佛本生故事更为佛教文学增光添彩。如马鸣菩萨所撰《佛所行赞》是印度文学史上堪与两大史诗媲美的重要诗篇。

在佛陀讲述的故事里，各阶层的人物，各种动物虫鸟均有反映。这些故事多是因事立说，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而发，洋溢着佛教的一些基本教理，如和平、牺牲、博爱、平等、克制贪欲、禁戒残暴、轮回业报等等，在佛陀的座前经常集满了善男信女，合掌静听。这些开始只是以口头讲述为主要形式的故事在佛陀涅槃后被他的弟子整理成

文字，第一次大结集时被悉心加工润色，又经过长期的口述、传写，分散的佛经故事汇成专集，形成颇具规模的文学作品。系统化的佛经文学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三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的想像力极为丰富，浸润着强烈的佛教果报、无常思想；其二，它以诗歌、散文与各种譬喻杂用，语言诙谐，文体活泼自由；其三，它伴随着佛教僧侣的行迹以俱往，在东方许多国家的文学艺苑中吐放芬芳。

四

汉译佛经文学是中国文学园地上的一枝奇葩。佛经翻译在中国持续近千年，始于后汉，盛于唐代，总括达两万卷以上。如此浩瀚的卷数，比古代的二十四史多出六倍。译经事业促进了佛教的昌盛。也给中国文学以深远影响。

佛经传入汉土后，主要被视作宗教经典。信徒敬若神明，担当润色传译的工作非一般学人所胜任，多由当时第一流的国学能手担任。为求得切合经典原意，遂以散文与韵文杂用而构成一种崭新文体，与当时流行的骈文与古文相抗衡。竺法护所译《修行道地经》，质朴纯清，毫无浮华习气，极具文学风采。

昙无讖以韵文译出《佛所行赞》，这首长达 9300 行的叙事诗在描写和记述方面无不尽致，文笔优美，读来朗朗上口。据梁任公先生考证，中国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即是受了它的影响。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风靡一时，可视为一部引人入胜的小说，六朝名士人人共读。其无论长行、偈颂都富有朴实平易的白话文学的风格。当魏晋六朝文坛盛行词藻华丽、堆砌虚浮的骈体文时，佛经翻译文学如一缕轻风，“吹皱一池春水”，清新素雅的韵文与散文结合的文风使人耳目一新。

唐代以后，变文兴盛。所谓变文是指变更佛经本文而成通俗之文。敦煌藏经洞大量变文的发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空白。变文的主要特点是散文与韵文的结合，通俗易懂，引人入胜。郑振铎先生所著的《中国俗文学史》将变文单列一章，认为“从唐以后，中国的许多新兴文体便永远烙上了韵文散文合组的格局。讲唱变文的僧侣们在传播这种新的文体结构上是最有功绩的。变文的韵式至今还为宝卷、弹词、鼓词所保存，可谓源远流长了。”《维摩诘经变文》是变文中最繁复的，篇幅极长，讲散文，唱韵文，连讲带唱需经数月才能完成。《大目犍连变文》中目连救母的故事至今流传民间。在变文

基础上又衍生出俗讲，其弘法之声宛转动人，穿插故事，讲唱结合，效果甚佳。其后的鼓子词、诸宫调、宝卷、弹词等文学形式均渊源于变文。至于小说受变文、俗讲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唐时传奇小说盛行，无论其杂记、神仙传、列仙传都富于想象力，文字浅显，心智超然，受佛经文学的影响甚深。佛教典籍本身即具备小说体裁，如《维摩诘经》中对天女散花的描写，文殊师利问维摩居士病情的叙述，都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情节性极强。宋代流传的话本即是经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讲的小说。

佛经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体裁的革新变化，亦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上。魏晋以来的小说、诗歌、戏曲等文学作品，佛教哲理投影其中，使其浸润着人生虚幻无常、因果报应思想。作品所反映出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有一些共同的意念，这种意念是佛教的精髓，深入到民族心理结构之中。得道高僧喜在“水边林下，长养圣胎”，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是也。这种对大自然的情趣启迪了许多山水诗人的智慧，写出意境深远的诗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没有悲剧，连《窦娥冤》这种大悲大冤的题材最后还要加上平冤还魂的团圆结尾，这种审美理想亦是受佛教因果报应观念

的影响。善恶各有报应，各得其所，由此导致所有文学作品的皆大欢喜结局。

中国文学作品也有些从佛经文学中移花接木的现象。正如鲁迅先生指出：“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佛经故事“仁慈的国王”即是以印度家喻户晓的大史诗《罗摩衍那》中的英雄国王罗摩为原型的。该史诗中的神猴哈努曼形象通过译经传入中国，启发了吴承恩的想象力，使他塑造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而“画水求盂”则使人想起中国古代“刻舟求剑”的故事。“空中楼阁”也使人想起广为流传的类似故事。

五

佛经卷帙浩如烟海，内容庞杂，文学故事散见于各种经典中，相当分散。此集所选故事只能反映出佛经文学的概貌，有助于读者了解佛教、精读佛经和研究佛经文学。

佛经故事内容丰富，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一则本生类、一则佛传类、一则教理类、一则寓言类。本生类即是反映佛陀过去世的故事，讲述佛陀的善行，宣传佛陀的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理论，教导人

们避恶向善，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有大善大德的菩萨才能转世成佛。佛传类反映佛陀现世的生平事迹，故事包括佛陀降诞、出家、成道、弘法、普渡众生及最后的涅槃。教理类则明确宣传佛教的教义和思想，如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寓言类最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妙趣横生。我们在选编这些故事时对一些佛教术语、生僻字句作了注解，对故事作了评介。最后应当指出的是，佛经文学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其中不少劝人为善、启迪智慧的内容，对精神文明的建设也会起到有益的作用。

中国佛教文化丛书

主 编 刘万朗

副主编 李向平

黄夏年

